

The Politics of Leisure Policy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s)



[英] **亨利** (Henry, I.) · 著

陈渝秉 潘悦然 · 译

休闲政策政治学

LEISURE

中国旅游出版社

L 西方休闲研究经典译丛

[英]亨利(Henry, I.)·著
徐菊凤 陈愉悦 潘悦然·译



休闲政策政治学

LEISURE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建华 王 从

装帧设计：谭雄军

责任印制：冯冬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休闲政策政治学/ (英) 亨利 (Henry, I.) 著; 徐菊凤, 陈渝秉, 潘悦然译.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0.10

(西方休闲研究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 The Politics of Leisure Policy

ISBN 978 - 7 - 5032 - 4040 - 9

I . ①休… II . ①亨…②徐…③陈…④潘… III .

①旅游业—一方针政策—研究—西方国家 IV . ①F595. 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454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 - 2008 - 4688

©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The Politics of Leisure by Ian P. Henry.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this right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书 名：休闲政策政治学

作 者：(英) 亨利 (Henry, I.)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100005)

http://www. cctp. net. cn E-mail: cctp@cnta. gov. cn

发行部电话：010 - 85166507 85166517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2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14

印 数：1 - 3000 册

字 数：260 千

定 价：45.00 元

I S B N 978 - 7 - 5032 - 4040 - 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西方休闲研究经典译丛》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杜江

委员（按姓氏读音排序）：

- 陈志学（中国旅游出版社）
戴斌（中国旅游研究院）
杜江（中国旅游研究院）
黄金山（中国旅游出版社）
Iso-Ahola（美国 Maryland 大学）
Julio Aramberri（美国 Drexel 大学）
卢昌崇（东北财经大学）
Mclean（美国 Nevade 大学）
王建华（中国旅游出版社）
魏小安（中国旅游研究院）
谢彦君（东北财经大学）
张润生（中国旅游出版社）

翻译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杜江

副主任委员：谢彦君

委员（按姓氏读音排序）：

- 杜江（中国旅游研究院）
李天元（南开大学）
李仲广（中国旅游研究院）
卢昌崇（东北财经大学）
谢彦君（东北财经大学）
张广瑞（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凌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张梦（西南财经大学）

出版说明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伴随国家黄金周、小长假和带薪休假制度的陆续实施，中国旅游业正在从观光旅游经济向观光、度假、休闲等多种形式并存的休闲旅游经济的转型升级中。为了有效借鉴国外旅游发达国家对休闲产业和休闲经济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的旅游科研、教学和从业人员提供有益的研究参考读物，我们策划出版了《西方休闲研究经典译丛》。本《译丛》是从国外 2000 多种有关休闲旅游的理论著作中，经过反复筛选出来的。计划出版 20 种，第一批推出 6 种，分别为《现代社会休闲与游憩》、《休闲和旅游供给：政策与规划》、《休闲社会心理学》、《休闲与游憩：一个多层次的供递系统》、《休闲理论原理与实践》、《休闲政策政治学》，反映了西方休闲和旅游研究的最新成果。由于作者的研究视角、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书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种学派和不同观点，包括西方有关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论述，这并不代表我们赞同他们的观点和表述，希望读者注意并加以甄别。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前　　言

写作该书的第二版，不但可以让我吸收那些关心休闲政策与政治的同事、学生和朋友的经验和辩论结果，还可以让我重新思考第一版中那些引发争论和批评意见之处。尽管我认为第一版的框架可以解释该领域过去所发生的情况，我还是从大家的讨论中获益，得以提炼并重新界定某些问题，以符合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政策发展情况。与同事和学生的互动，的确丰富了我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也使我愉悦地认识到本人在这一领域的责任。

本书第一版的许多观点和结构产生于与彼得·布拉汗姆（Peter Bramham）的讨论和合作。彼得的想象力，学术上的严格和谦逊使我们在专业和私人关系上的合作都富有成效。与此同时，他高水平的幽默感也使这一工作变得非常有意思。我很荣幸得以在伊尔克利（Ilkley）与彼得和同僚共同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策问题，包括雷·海伍德（Les Haywood），弗兰克·奎（Frank Kew），约翰·斯宾克（John Spink）以及约翰·卡彭纳赫斯特（John Capenerhurst），他们在我们有限的见面机会中，还一直对我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政策部分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另外，与休闲研究社团人员的讨论也对我有帮助，我尤其受惠于佛瑞德·科尔特（Fred Coalter）和克里斯·格莱顿（Chris Gratton），他们对我的早期内容提出了许多建议。

在第一版印出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得以在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学的体育教育系、运动科学和休闲管理系，尤其是运动与休闲政策学院吸纳很多当地养分。来自于同事和研究生的慷慨指教和激励是主要的收获。我尤其需要感谢有机会与休·格里布提斯（Sue Glyptis）教授一起工作，她从容的专业至上态度对人是一种鼓舞。其他同事，泰丝·凯（Tess Kay）、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鄂勒尼·瑟多拉基（Eleni Theodoraki）、利萨·基库利斯

(Lisa Kikulis)、盖伊·杰克逊 (Guy Jackson)、乔·马奎尔 (Joe Maguire)、艾玛·珀尔顿 (Emma Poulton)，以及最近利·罗宾森 (Leigh Robinson) 和巴里·霍利汉 (Barrie Houlihan)，组成了出色的评论圈，与此同时，研究生作为一个整体为我在这一政策领域的教育发展也提供了不小的帮助。我特别要提到吉恩·尤尔 (Jean Yule)、潘特里斯·纳辛 (Pantelis Nassin)、杰·伯克·里 (Jae Bok Lee)、莱昂内尔·阿纳德 (Lionel Arnaud)、绢·路易斯·帕拉默·萨斯尼斯 (Juan-Luis Paramio Salcines)、尼克·马湿斯 (Nic Matthews) 和大卫·登野 (David Denyer)。与大卫 (David) 和胡安 (Juan) 的讨论 (他俩都在谢菲尔德大学专攻政策领域问题)，对我深入了解第 7 章中有关城市的状况有贡献。

除了享受这些“家乡”资源外，我还极大地获益于欧洲的同行圈。他们为拉夫堡 (Loughborough) 大学、德斯图大学 (Deusto)、提尔堡大学 (Tilburg)、布鲁塞尔的佛兰芒自由大学 (Flemish Free) 的学生授予欧洲休闲研究机构 (PELS) 文学硕士学位 (MA)，如埃里克·科瑞因 (Eric Corijn)、罗伯特·圣·萨尔瓦多 (Roberto San Salvador)、雨果·范·德·珀尔 (Hugo van der Poel)、阿那·戈夏 (Ana Goytia)、汉斯·莫马斯 (Hans Mommaas)、瑟欧·贝克丝 (Theo Beckers)、格雷格·理查兹 (Greg Richards)，还有各种各样的学生，他们共同构成了对政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观察视角。我也很荣幸地与里昂第一大学 (University of Lyon I) 的吉恩·卡米 (Jean Camy)、埃克斯—马赛第二大学 (University of Aix-Marseille II) 的克里斯廷·杜拉克 (Christine Dulac) 在法国公共政策发端等问题上共同探讨，尽管这些素材并没有直接运用在本书中，但它有助于洞察法国两个城市的企业家精神和社会准则。

我也同样感谢英国地方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他们付出了时间接待我的访问并与我讨论有关问题，许多人已经无法在此提及名字，因为他们往往作为随行人员陪同接见。在此我特别提到戈登·贝茨 (Gordon Bates)，米德尔斯堡市 (Middlesbrough) 前休闲与艺术局负责人、休闲与宜居管理研究所所长，他对于当地政府变革的分析总是很敏锐，而且是代表着一种“亲身实践”者的关键思考。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出色的宣传媒介和激励因素。

最后也最意味深长的，我要感谢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卡罗尔 (Carol)，我的两个儿子阿拉斯待 (Alasdair) 和詹姆斯 (James)，他们不大恭敬但却持久不衰的支持，为我提供了一种思考的价值，并使这件事情物有所值。

本书阅读指南

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对长期以来处于变革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休闲政策与休闲实践进行分析。它不仅试图描述休闲政策的发展，还通过关于英国政府在休闲领域的本质和角色的理论争鸣来说明它的形态和发生年代。当福利政治导致消费服务供给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现问题时，休闲的生产性功能（促进收入、刺激其他形式的投资），作为一种身份认同方式，致使休闲政策具有了新的意义。其结果，使政府在休闲问题上的介入程度的基本理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新工党在 1997 年执政时，它面临着在接受前辈培育出的市场导向发展模式的同时，如何重新构建社会进程的问题。

本书主要关注政府的休闲政策措施，重点关注运动型、主动型休闲活动以及艺术和文化类的政策。它也涉及旅游，但主要限定在政府相关休闲活动政策和媒体政策方面。这种限定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当大多数人都认为看电视是其闲暇的主要追求时，有人却声称对他而言不是。然而，尽管休闲是一种包含了范围很广的多种要素和活动的全新现象，但还是有必要只集中讨论某些范畴的内容。

第 1 章从历史角度讲述产业革命以来政府在休闲事务中的作用。集中讨论了在明显奉行“不干预”政策的历史阶段，政府如何深度干预休闲问题，限定人们的休闲行为，缩减人们的休闲时间。之后一直到“二战”后，政府福利扩大中不断增加的休闲政策，也在这一章中进行了描述，其主要事项都在第 1 章末尾的表 1.1 中列明。

第 2 章对后来阶段的休闲政策进行了逐年阐述，但清晰地聚焦于政治意识形态和休闲政策的关系上。有关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被多次提到，它们对于休闲政策的意向也被列示出来。其中对新工党试图界定其意识形态立场的情况给予

了特别关注。意识形态中有关性别和种族的倾向与休闲政策的关系也一并予以了考虑。有关问题引发的争论被摘要地反映于本章末的表 2.1 至表 2.3。

第 3 章重点论述当代中央政府的休闲政策状况，以及一些政府理论，看它们如何帮助人们理解政府政策为何出台以及如何出台。概要论述了政府的竞争理论，以及它们如何被用来作为当代英国政府休闲政策的合理解释框架。

休闲政策的许多细节形成和补充规定的责任则依照惯例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为许多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斗争提供了战场，比如右翼及其对手在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发生的斗争。由于新自由经济学派的撒切尔主义寻求压缩地方政府开支并强求更高的效率，因此破坏了地方的自治。这种情形延续到 90 年代，因此地方政府就将休闲培育为潜在的经济力量。

第 4 章讨论 90 年代以及新世纪保守党和工党领导时期地方政府休闲服务的具体内容，接下来的一章讨论这些变化对休闲服务专业化的影响。“休闲专业”是 70 年代初出现的概念，那时候社会上的主体休闲事务是福利性的半专业化。

第 5 章概述了公共部门为了适应当代经济发展要求而开始介入休闲服务的专业化领域，以及在休闲领域新出现的新管理主义现象。

第 6 章对休闲产品领域中的商业化供给和志愿机构之间的互补关系进行了分析。它还试图解释这些有关休闲的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两极日益分化的英国社会结构中。

第 7 章阐述了调节理论 (regulation theory) 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如何引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的休闲公共政策发生变革。调节理论介绍了一种关于变革的观点，即我们已经从一种经济组织转向另一种，从福特制 (Fordism) 转向后福特制 (post-Fordism)、新福特制 (new-Fordism)，或者说是后现代福特制后 (after-Fordism)。这一章认为尽管这种转变在当时没有完成，但是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为止的政府所寻求的社会关系都是有意在完成这一转变。表 7.1 总结了这一章中涉及的有关争论。为了证明当代英国在休闲政策制定方面是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我们引用了谢菲尔德 (Sheffield) 在休闲政策方面的转变作为例子。

本书最后一章说明战略关系作为休闲政策中的政府角色在地方间和国家间所起的作用，尤其关注了欧盟对各国休闲政策方面的干预。

全书的中心观点既是一致的，也是递进的，而各个章节也根据其主题保持相对独立性。这使得读者既可以将本书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也可以选择性地阅读。

目 录

前言	1
本书阅读指南	1
第1章 休闲政策政治学	1
引言	1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休闲政治与政策	5
结语	20
第2章 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央政府的休闲政策	24
引言	24
自由主义：新右派的政治哲学	26
保守主义	28
社会主义	30
新工党：寻找第三条道路	33
休闲政策中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36
性别、种族、政治意识形态和休闲政策	47
社会民主共识的侵蚀	55
第3章 休闲、国家和政策：新工党在新世纪	58
引言	58

“新经济现实主义”和福利国家的重建：1976～1984年间	
若干休闲政策在工党和保守党政府之间的延续	58
国家政策弹性化和投资的削减：第一部分 撒切尔政府执政	
后期新右翼休闲政策提上日程，1985～1990年	64
国家政策弹性化和投资的削减：第二部分 休闲政策和梅杰	
政府的行政措施，1990～1997年	70
新工党及其对责任市场的寻求	76
休闲：国家和社会理论	83
第4章 地方政府和休闲政策：从撒切尔时代到现代化议程	95
引言	95
20世纪70年代地方政府的休闲服务：福利国家的武器	96
地方政府和新经济现实主义，1976～1985年	97
地方政府休闲服务政策的变化和投资的缩减：1985～1997年的	
保守党政府	102
寻求责任市场：地方政府和新工党的现代化议程	115
结语	120
第5章 休闲专业人员	121
引言	121
从设施经理人到自由福利专业人员：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	
休闲管理	122
20世纪80年代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中的专业化：从福利观念到	
新经济现实主义	126
国家政策弹性化和投资紧缩状态下的休闲管理：新右翼、	
新管理主义和竞争管理	127
寻找责任市场：从契约文化到改革管理	129
结语	131
第6章 商业机构和志愿团体	132
引言	132

工业化的英国商业和志愿机构在休闲领域发展的历史背景	133
21世纪初期英国的休闲和商业部门	145
20世纪80~90年代英国的休闲和志愿团体	157
结语	160
第7章 休闲的社会调节与治理	162
引言	162
调节理论：对变化中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进行解释	163
撒切尔主义的领导权计划，后福特制和城市休闲政策	166
后福特制的地方政府和休闲政策	172
谢菲尔德的休闲政策：从左翼福特制至右翼后福特制的历程	177
结语：对于地方、国家及跨国界之上三个层面对休闲政策不同影响的评论	186
第8章 休闲政治与政策：全球环境下的战略关系	193
战略关系和政策：城市和民族国家	194
战略关系与休闲政策：欧洲联盟	197
结语	204
进一步阅读指南	206
后记	208

第 1 章

休闲政策政治学

引　　言

20世纪60年代初，紧随着“二战”后人口的迅速增长期，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60）感觉到可以断言《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他提到有关社会民主政治和机构的一些政治共识。曾经出现于贝尔和其他人面前的政治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此时已经显得过时了。30年之后，福山（Fukuyama，1990）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书中对此发出疑问，他在该书中也提到政治左派和右派争论有终止的迹象，但他所提的是新自由主义模式中的左派和右派。贝尔断言的错误（他的书出版后，公共领域就迅速出现了政治化倾向，尤其是在英国，激进的左派力量苏醒，撒切尔主义也开始出现）警告我们，对另一种范式做出永久性假设也是有风险的。

在英国，20世纪末，新工党政府被选举出来，他们正在拼命寻求一种界定其政治立场的手段，以表明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术语方面与其以往的政治反对派身份和曾经的“社会主义者”身份的不同。他们在20世纪末的数十年内对于自身定位与正统性的斗争，为本书的核心主题提供了背景铺垫，有助于解释新千年伊始英国休闲政策的出现、形成及其内涵。

如果从学术研究角度对休闲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简单的描述，可以认为其经历了理论上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正统多元论的兴起，肯·罗伯茨（Ken Roberts，1978）对此做了最清晰的论述。第二阶段突出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多元论提出了一系列激烈的批评，集中在结构上

的社会分化和不均衡问题上，使用的是新韦伯理论（Coalter, Duffield and Long, 1987）、新马克思主义理论（Clarke and Critcher, 1985; Hargreaves, 1986）、女权主义理论（Deem, 1986; Green, Hebron and Woodward, 1990; Winmbush and Talbot, 1988）以及社会党政策程序论（Whannel, 1983）来挑战多元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浪潮袭入社会学领域，休闲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开始出现，当主流社会学理论家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严肃地投向文化、休闲和生活方式问题时（Balldrillard, 1988; Lash and Urry, 1994; Urry, 1990），一些休闲理论家也积极采纳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Rojek, 1994），以与过去十年中结构主义依据确定性对他们偏激的批评形成对照。与此同时，作为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应，休闲理论的第四个阶段清晰显现。整体分析论——一个比较传统的理论得到壮大，它被用来分析休闲体验和休闲管理的日趋全球化特征，对文化全球化（Robertson, 1992）和体育全球化（Maguire, 1995）的解释，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这四个“阶段”为理解当代休闲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一些理论知识背景。

休闲服务的提供，本来是政府的事情，现在主要成为地方政府的职责，而地方政府在过去30年中毫无疑问地成为最遭受意识形态、财政和行政压力的一级机构。但也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对于政府和休闲的研究最为欠缺。20世纪70年代对于地方政府的经验性分析（Blackie, Coppock and Duffield, 1979; Dower, Rapoport, Strlitz and Kew, 1979; Lewes and hfennell, 1976; Travis and Veal, 1979）并没有缺少任何已有的休闲政治分析框架，主要采用了不清晰的多元化视角。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部分归因于财政困难（主要是行政系统内的运行压力）对公共机构的休闲政治研究比较有限。科尔特等人（Coalter, 1987）对公共机构在休闲投资方面的研究成为一个例外。然而这一研究需要聚焦于行政者通常所说的基本原则，而不是研究行政者的兴趣，不是分析政策的决策过程与结果，也不是要激烈地批评此前提到的该阶段地方政府休闲政策研究存在缺失。对于将强制性竞标计划（简称CCT）作为一种政策的影响的一些探讨，无论是有意的还是含蓄的，都表达了休闲领域的强制性竞标具有负面的重复分配效应（Centre for Leisure and Tourism Studies, 1992; Centre for Leisure Research, 1993），而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工党政府所颁布的“最佳价值”方案问题的研究（Nicholls, 1999; Williams, 1999）。这一问题的

本质并不在于进行了政治学分析，而在于体现了专家治国论倾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后现代主义在许多领域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例如，福柯式的能力评论但事实上在休闲政策方面没有出现这样的研究。无论如何，全球化和政府治理已经为探讨地方休闲治理问题提供了动力 (Henry, 1999)。然而，所出现的情景却是对于地方政府层面休闲政策研究的相对欠缺，这些问题超出了那些专业研究者的视野，例如强制性竞标、质量保证和最佳价值问题。本书即试图弥补这种平衡关系，直接探讨地方政府的休闲管理问题。

尽管在 20 世纪最后的 30 年中，休闲政治问题日益紧张和态度敌对，但并不意味着早期福利政府的发展和稳定阶段这一政治斗争就没有，事实上在现代英国的整个工业化时期一直都有。公开利用休闲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做法，在有关查尔斯一世的《国王的运动》一书中有实例，他为了寻求统一战线以对抗新生的信仰新教的中产阶级，让贵族和平民加强了联合。这种表态传递出君王对某些大众娱乐活动的支持，而这些娱乐活动是被清教徒运动禁止的。因此，休闲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工具，或者推广某种兴趣项目的手段，早已有之。它也因此成为本章解释 19 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休闲政治和政策演进的关注点之一。这样一种历史化的解释提供了识别过往时期休闲政策发展轨迹的机会，并探究出当今政治斗争的历史前辈。

在做出这些回顾之前，必须先阐明本分析中所使用的核心术语的用法。这里所用的“政策”概念，“包括所有政府行为的指令，不仅有政府的意图……还有对政府在某些事情上为什么选择不作为的理解” (Goldsmith, 1980: 22)。分析公共政策时如果只简单涉及政治家或官员的意图和政策内容，我们将会错过许多重要的相关问题，例如，政策采纳后的结果、政策的被抵制、政策观点被选择的过程、“不决定”的相关问题。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对政策内容、政策决定（包括不决定）以及政策执行和执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罗威 (Lowi, 1972) 将公共政策归纳为 4 种类型：分配性政策——使全体或大多数公民无差别地受益；再分配政策——总体上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让另一部分人获益；制宪政策——民主社会中严格规定的程序，例如选举法；最后，管制性政策——控制社会成员的行为。休闲政策最主要的是其中的三种类型。它们可能是分配性的，例如发行体育债券以助国家在体育方面取得成就鼓励民心，或者是再分配性的，在休闲供给方面着眼于特殊群体或特别地区，

例如为失业者或有特殊需求的地区。最后，它们也可能是管制性的，例如，禁止使用娱乐性药品。管制政策，作为对休闲安全的维持，显然与政府对需要培育或者控制哪些休闲活动这一重要问题密切相关。有关政府在此方面的休闲政策介入的研究，一直受到新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们——如颇有影响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Hall and Jefferson, 1976），以及其他人的激烈批评（Hebdige, 1988）。然而，本书首先关注的还是政府的分配性休闲政策和再分配性休闲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所带来的益处。

对“休闲”一词的定义作些初步介绍也是有用的。这并非意味着本书要进入那种无结果的定义之争中，而是要强调为什么这种争论是无结果的，并突出显示休闲政策所涉及的一些理论内涵。休闲研究文献充满了对休闲本质含义的界定（可供比较的有：Kaplan, 1975；Murphy, 1981；Neulinger, 1974；Parker, 1971），这些研究总是发现，要提出一种既包括了所有“休闲”含义又排除了所有“非休闲”含义的定义，实在是困难。休闲被定义为“剩余的时间”；或者是从“功能”角度定义（尤其与“工作”的含义相反）；或者是从“内容”（休闲活动）角度定义；或者是作为一种“理想的心理状态”。许多作者都跟随卡普兰（Kaplan）采用复合定义方式，从时间/功能/内容/心理状态多个方面去界定“休闲”。

休闲……包括一个人在其经济自由时间内所进行的自主性活动或体验，这种活动被当事人认为是休闲的，给人精神上的期盼或事后的回忆是愉悦的，让人无意识中投入了全部注意力和热情，包含着富有特色的规范和制约因素，为娱乐、个人成长和服务他人提供了机会。

(Kaplan, 1975)

事实上很明显，当我们应用“休闲”这一术语时，不可能穷尽上述休闲定义中的所有要素。因此，上述休闲构成要素并不代表着我们应用“休闲”这一词语的必要条件，然而却可以成为其充分条件。从维特根施坦（Wittgenstein）的术语体系来看，我们所用的各种词语中，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家族相似性”，而不是彼此之间属于迥然相异的独立体系，“休闲”一词也是如此（Wittgenstein, 1970）。

本书在运用“休闲”一词时，大概符合上面有关休闲本质之解释的三种内涵。首先必须明确，“休闲政策”在不同的语境中的所指会有细微差异，但它们都属于一个含义范畴内，有“家族相似性”。因此，休闲政策可能关乎人的自由时间，关乎人们消极的或积极的娱乐活动（体育方面、艺术方面、流行文化方面或者非正式娱乐方面），关乎补偿人们由于工作导致的异化（或者失业），关乎通过业余活动使人获得个人成功。其次，休闲政策可能与某些语境中的“教育”或“教育政策”的含义重合，但我们的界定不必试图排除一切非休闲的情况。最后，我们还必须意识到，由于理论立场的不同，人们对于同一术语所强调的侧重方面也有不同。一方面，结构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侧重于认为休闲具有将人从工作或非工作的异化状态解放出来的作用；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者倾向于强调休闲的合法性作用，因为有报酬的工作与休闲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而保守党理论家们则认为休闲政策是为了让文化生活与物质生存分离开来，强调休闲作为一种具有非功利主义活动的作用，或者是心灵的一种状态。对于休闲的这些理解，肯定都有片面合理性。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休闲政治与政策

有许多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将对休闲政策的回顾起点放在 18 世纪末，一个工业化及其伴随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开始的时间点。对有些著作人而言，休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类别，是工业化自身的产物，是将工作和非工作分开，使工作成为具有明确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纪律的概念（Clarke and Critcher, 1985; Murphy, 1981; Myerscough, 1974）。其他作者则强调，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逻辑，那种认为文化产品应该与物质消费区别开来的观念已经在 19 世纪被应用到休闲领域中，在都市化和集中居住的人群中这种观点最为典型（Bailey, 1987）。或许在本书中关于当代休闲政治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在从农耕社会转向城市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在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类似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之后的英国开始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建。18 世纪初发生的变革与 20 世纪晚期发生的变革，或许在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后工业化理论家那里从一个角度给予解释，而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给予另一种解释。不过有两点却是